

黃河中游新石器時期的玉器

—以館藏寧夏地區玉器為中心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羅丰

提 要

過去寧夏地區新石器時期玉器不被學術界所瞭解，本文對寧夏境內館藏的新石器時期的玉器進行詳盡介紹，並對其年代進行簡單比定，對於這批玉器可能所屬的文化有一些推測，鳳紋玉琮是一件尤可注意的物品。關於製作工藝的想法來自對一些半成品的觀察。

關鍵詞：寧夏、新石器時期、玉器

一、引 言

上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大陸考古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伴隨著考古工作的廣泛開展，玉質製品也不斷出現在遺址、墓葬之中，其中商周以前的玉器最為引人注目。尤其是近年來西北地區齊家文化的玉器被識別，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新石器時代玉器的認識水平。為了增進人們對新石時期西北地區玉器的進一步瞭解，我們對寧夏回族自治區內博物館、文物管理所歷年來所發掘、徵集到的玉器，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工作，現將所獲介紹於後，希望能對有關研究工作有所益助。

在此之前我們首先有必要對西北玉器研究史有一個非常簡要的回顧。過去，人們在研究西北地區新石器時期文化時，經常性的注意到農業、養畜業中陶器和石器，玉器則不在關注之列，這主要是玉器並不常出土於一般的墓葬、遺址中，至少在西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中是這樣。儘管這樣，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玉器

仍然在中國的玉器考古研究中被首先注意到的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曾在河南、甘肅、青海等地的新石器遺址中，得到斧、鏃、鑿等一些玉製品²。但在此以後的北方地區遺址墓葬考古發現中所獲玉器甚少，與東北、東南及南方大量發現玉器的情況恰恰相反，以致於人們在八十年代末仍然得出這一種印象：「黃河中、上游河北、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青海、寧夏諸省（自治區），田野考古工作開展最早，發掘面積亦最大，然出土之新石器時代玉器卻寥寥無幾。故有充足之理由可認為，新石器時代此一廣袤地區之玉器製作，遠落後於東北、出東、江浙地區」³。得出以上結論顯然與上述地區的考古工作有關，或許與材料公佈滯後程度密不可分。九十年代開始，一些學者開始陸續介紹西北地區一些玉器⁴，引起學術界的關注⁵。與此同時葉茂林以《齊家文化的玉石器》為題，全面系統地討論了甘肅、寧夏、青海地區的齊家文化中所謂玉石器問題，因葉氏討論的基礎是以考古材料為中心，特別是將一些石器也納入其中⁶，因而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相較起來對西北地區玉器的研究臺灣學者尚早一些，並注意到了其中一些關鍵性的問題⁷。最近幾年，楊美莉⁸、黃宣佩⁹、閻亞林¹⁰等人對西北新石器時代

- 1 閻亞林曾經引清朝人劉大同《古玉辨》「古玉出土者，以陝甘為最多而最上」，認為其中當和齊家文化有關（參見氏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北京市：北京大學考古系碩士論文1999年，頁1。）
- 2 J. 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5, Stocrhholm, 1943, pp124-128.
- 3 楊建芳編著，《中國出土古玉》第一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4。即使有稍後出的《中國玉器全集》中仍然對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玉器缺乏足夠的瞭解（參見雲希正、牟永抗《中國史前藝術的瑰寶—新石器時代玉器巡禮》，《中國玉器全集·原始社會一》，石家莊市：河北美術出版社，1993年，頁23-35）。
- 4 參見馬志平，〈甘肅出土玉器拾零〉，《文博·古玉研究專刊》增刊第2號，1993年，頁68-69；吳平：《齊家文化玉器》，《青海文物》第10期，1996，頁10-18。
- 5 楊伯達，〈齊家玉文化初探—記鑒定全國一級文物所見甘肅古玉〉，《隴右文博》，1997年1期，頁10-18。
- 6 葉茂林，〈齊家文化的玉石器〉，《考古求知集—96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251-261。
- 7 參見鄧淑蘋，〈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概論〉（臺北市：1985）頁110-205；楊美莉，〈中國古代環形玉器的發展〉（上），《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二》（臺北市：1993）頁199-271；〈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古代西北地的環形玉、石器系列之一—齊家文化風格的環形器〉，《故宮文物月刊》8卷8期（1994）頁66-79；〈試論新石器時代北方系統的環形玉器〉，《故宮學術季刊》12卷1期（1994）頁73-118；鄧淑蘋，〈中國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論〉，《中國文物學會年刊》，1995年，頁44-58，在此文中鄧氏提出所謂「羌文化玉器」即華西系統，不過根據閻亞林的敘述鄧氏華西系統玉器的提出在〈試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玉器文化〉中《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市，1992）未見其原文（參見同注1閻亞林引文2頁）
- 8 同上，楊美莉文，另有〈多孔石、玉刀的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5卷（1998）頁17-74；〈齊家文化玉器的性質與特色〉，《淡江史學》第11期（2000）頁1-20等文。
- 9 黃宣佩，〈齊家文化玉禮器〉，鄧聰主編《東亞玉器》第一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頁184～191。

的玉器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調查，使國內外學術界對西北新石器時代的玉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尤其是隨著天水師趙村報告的正式刊佈¹¹，科學發掘資料今後將成為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中尺規性材料。另外，西北玉器的礦物學觀察亦對玉器研究有所幫助¹²。

二、器物的分類觀察

（一）概述

在器物的分類敘述之前，應先對描述物件的概念做一個簡單的界定。古人對於玉材並無一個明確的界定標準，所謂「石之美者謂之玉」的說法由來已久，伴隨著現代學術的進步，一些地質學的描述或術語被引入玉器研究之中，這無疑促進人們對玉器加工、轉移方面的認識，但如果過份強調只有所謂角閃玉（Nephrite 軟玉）、輝石玉（Jadeite 硬玉）之類才是真正玉器，則會割裂中國人用玉的傳統，因為所謂真玉與似玉石在加工技術上有難易之區分，但在古人使用時思想上或無天壤之別，故筆者贊同十多年前鄧淑蘋的觀點：在「研究中國玉雕藝術，則不能謹守礦物學的嚴格定義，必須考慮多項因素，許多似玉的美石，亦因其「五德俱備」，而納入玉器行列一併討論」¹³。

寧夏地區的新石器時期的玉器主要集中分布在南部即屬固原地區的固原、海原、西吉、隆德、彭陽等縣，這些地區也是寧夏新石器時代遺址集中分布地區，主要的工作地點有西吉興隆鎮¹⁴，固原海家灣¹⁵、店河¹⁶、海原漕窪¹⁷、菜園¹⁸、隆

- 10 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另外吳棠海亦曾考察了甘肅、寧夏地區的新石器時代的玉器，不過其結果沒有正式發表，據閻亞林稱有《講義》刊行。
- 11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著，《師趙村與西山坪》（北京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其中與玉器有關的章節從頁73-31。
- 12 參見閻廣，〈中國大陸史前古玉若干特徵〉，鄧聰主編，《東亞玉器》第三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頁217-221；另外臺灣大學錢憲和等人對西北地區新石器時期玉器亦有鑒定（錢憲和等，〈古玉器上常見之沈積結構及岩理〉，《中國古玉鑒製作方法及礦物鑒定》（臺北市：地球出版社，1998）頁64-65，轉引自楊美莉〈中國古代環形玉器的發展〉（上），頁2；錢憲和，〈古玉之礦物學研究〉鄧聰主編《東亞玉器》第二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頁222-235。
- 13 參見鄧淑蘋《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概論》頁110。
- 14 鐘侃、張心智，〈寧夏西吉縣興隆鎮的齊家文化遺址〉《考古》1964年第5期，頁232-233、244。
- 15 寧夏回族自治區展覽館，〈寧夏固原海家灣齊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第5期，頁290-291。
- 16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固原店河齊家文化遺址墓葬清理簡報〉，《考古》1987年第8期，頁673-677。
- 17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等，〈寧夏海原曹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3期，頁206-209。
- 18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寧夏海原縣菜園村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9期，頁1-14；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海原菜園遺址切刀把墓地〉《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

德頁河子¹⁹，除此之處尚有一些零星調查、發掘²⁰。以上發掘中只有菜園、頁河子遺址中出土過零星玉器，其他遺址、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器。我們這次調查的玉器主要有以下幾批，其餘均屬於零星地點的徵集，雖這些玉器基本上都屬於徵集品，但出土地點大都清楚，並且在玉器徵集之後文物工作者曾前往出土地點進行查看，因此與傳統意義上的徵集品意義亦大不相同，楊伯達稱此類材料準科學資料²¹，葉茂林則提醒人們注意在研究史前玉器時“也必須意識到，這些採集品和徵集品不可能等同考古發掘”。如果大量依靠這些採集品和徵集品，就很難保證萬無一失²²。

我們在以下玉器的命名時，基本遵循了夏鼐所討論玉器命名原則²³。

1962年，固原縣張易鄉出土一批玉器，後為當時寧夏博物館籌建處所收藏。主要有玉璧、玉琮等。

1986年，隆德縣沙塘鄉和平村出土一批玉器，後為當時寧夏固原博物館收藏。有玉璧、琮等。

1982年，隆德縣沙塘鄉出土玉璧等，為隆德縣文物管理所收藏。

1984年，海原縣出土玉璧、琮等，為海原縣文物管理所收藏。

(二) 玉質工具

玉質工具有斧、鏃、鏹、鑿、磨棒、研磨器等種類。

1. 玉斧

標本1，1998年西吉縣沙溝鄉沙溝村徵集。通體磨光，上小下漸大。頂部玉材有些缺損，缺損部分經過斜面切割打磨。單面鑽孔，孔壁上大下小，有一些旋紋。身側切磨平齊，雙面直刃。通體呈墨綠色。長12.6、厚、刃寬4.5、孔徑0.8公分

19 北京大學考古實習隊、固原博物館，〈隆德頁河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頁158-195。

20 參見李非、李水城、水濤，〈葫蘆河流域的古文化與古環境〉，《考古》1993年第9期，頁822-842；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縣河川河谷考古調查〉；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寧夏考古文集》（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頁18-35；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固原地區新石器遺址調查簡報〉，同上，頁42-60。

21 參見楊伯達〈齊家玉文化初探—記鑒定全國一級文物所見甘肅古玉〉頁11-12。

22 葉茂林，〈黃河上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初步研究〉，鄧聰主編，《東亞玉器》第一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中心，1998）頁180-183。葉氏所提示的原則當然應當得到遵循，尤其是單純地從所謂徵集品中推演出一些重要的結論時，這個原則顯得更為重要。問題的另一方面是，由於考古發掘的偶然性，不能保證人們獲取質量、品種均上好的發掘品，這樣，徵集品的有限使用便顯得非常重要，退而求次的使用徵集材料，也是在研究西北地區新石器學者們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實際問題，我們應關注材料的原始科學性和次等性等層次性問題，具體個案尚需具體分析。

23 夏鼐在討論商代玉器分類、命名時主要將根據玉器類型、用途，將其分為「禮玉」、武器和工具（包括日用品）、裝飾品三大類（參見氏著〈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原載《考古》1983年第5期，後收入《夏鼐文集》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7-33）。夏先生雖然討論的是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原則，但完全適用於新石器時期的玉器，前者較後者遠為複雜。

（圖一，1）。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2，1992年，西吉縣興隆鎮羅莊村出土。長方形，通體磨光，頂部有殘損。身有一穿孔，單面穿孔，鑽孔上大下小，呈錐形，雙面刃，刃部圓純，一角稍殘，有使用痕跡。通本呈青綠色，上有白斑，長6.8、寬4.8、刃寬4.5、孔徑上0.8、下0.7公分（圖一，2）。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標本3，1987年西吉縣白崖鄉斜路窪村徵集。長方形，通體磨光。頂端磨平有打擊剝痕。上小下漸稍寬，身中部有一穿孔，單面直鑽，孔壁呈斜形，另一面孔徑周緣稍加打磨。兩側平齊，單面刃，刃面另一面側切呈斜面。通體墨玉色，長7.1、寬3.4、孔徑1.1公分（圖一，3）。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標本4，1987年西吉縣白崖鄉半子溝徵集。長方形，上部已殘，無穿孔。兩側平直，一側有切割痕跡，雙面刃，刃部似無磨損。通體呈菜綠色，青中泛綠，通長8.6、寬4.7、厚0.7公分（圖一，4）。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標本5，1982年固原縣官廳鄉官廳村黑馬泉出土，同出還有玉鑿。身上殘斷，上小下大，中部略厚，頂有一穿孔，單面直鑽，錐形，中部有一周深旋紋，孔邊緣亦經打磨。側部磨成圓角，雙面直刃。通體呈深色墨玉，殘長7.9、身寬4.1、厚2、孔徑上1.4、下1公分（圖一，5）。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6，1986年固原縣彭堡鄉彭堡村徵集。通體呈梯形，上小下漸寬，上厚下薄。頂部有缺角，磨成漫圓，無穿插孔，身中上部有一坑，坑邊緣有打擊痕，似原準備鑽孔，但後鑽孔位置與原材裂縫連起來，未能深鑽便放棄。身邊側有一條豎切割線。雙面刃，稍呈弧形。通體呈墨綠色。通長11.5、身寬6、刃寬5.9公分。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7，1984年隆德縣徵集。通體呈圭形，上窄下寬，頂端有孔，原身應更長，大約是在鑽孔時發生斷裂，製造者便放棄原計劃，將孔中央磨平，切磨時在邊留有一淺槽。孔為單面直鑽，上有旋紋，旋紋清晰，解玉砂的顆粒較粗，底部有由外向裡敲擊痕。側面稍斜，打磨成漫圓。身部有一條斜切痕。單面刃，刃部完整無損。通體呈色，長10.6、刃寬4.6、孔徑1.1公分（圖一，6）。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8，1986年，海原縣菜園瓦嘴WM134：12出土。長方形，通體磨光，身側較直，上下面大小稍有不一，頂部殘斷，似在外力作用下折損，刃部較身稍寬，雙面刃；一側有缺口。通體呈墨綠色，長9.8、寬5.1、厚1.2公分（圖一，7）。現為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2. 玉鏃

標本9，1986年隆德縣河子遺址T103：3出土。扁平長方形，通體磨光，頂端較小向上收縮，肩上已殘斷，原器似便於手把握。邊側稍斜，單面刃，刃面有使

用痕跡。通體呈墨綠色，殘長 6.7、寬 3、厚 1.1 公分（圖一，8）。

3. 玉鏟

標本 10，1999 年西吉縣興隆鎮出土。長條形，通體磨光，身中稍凹，兩側平直，身向下稍寬，頂側有一缺角。有一穿孔，單面穿孔，但有原規劃雙面對穿孔，穿孔呈錐形，直刃稍弧。通體呈深黑色，身有白斑，雙面刃，刃部無損。長寬 9.5、厚 0.6 公分（圖二，1）。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11，70 年代固原張易鄉徵集。長形，通體磨光，端有一圓孔，孔徑為 公分，刃部磨損甚多，呈三角狀，鋒刃均鈍。身上端黃中泛綠色，刃部則漸變為深褐色。長 13、寬 3.5、厚 1 公分（圖二，2）。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12，1986 年固原縣河川鄉上臺村徵集。長方形，通體磨光，頂部有切割鋸痕，無穿孔，兩側平直，弧形刃面，側有一鋸槽。通體呈白色，漢白玉質，長 10.8、寬 5、刃寬 5.2、厚 0.9 公分（圖二，3）。現藏固原縣文物管理所。

4. 玉鏹

標本 13，1985 年海原寨子梁採集。長條形，上端較大，下漸窄，頂端稍圓，有打擊剝落痕跡。雙面刃，刃面稍弧。通體呈黑綠色。現藏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標本 14，1985 年海原縣菜園 WM34:05 出土。通體磨光，長方形，表面斜向一側，側視呈楔形，不甚規則，單面刃。長 3.8、寬 2、厚 1 公分（圖二，4）。現藏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標本 15，1964 年 9 月隆德縣風嶺鄉上齊家村出土。長方形，頂部有切割痕，一角缺損，兩側一側平直，另一側呈圓角，單面刃，刃角圓鈍。通體呈綠色，周圍顏色泛黃，長 4.4、寬 2、厚 0.6 公分（圖二，5）。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16，1982 年固原縣官廳鄉官廳村黑馬泉出土，同出有玉斧。上窄厚，下寬薄，側面呈楔形，身側一面有明顯切割，雙面直刃。深色墨玉，長 6.4、寬 2.5、刃寬 2.6、厚 1.2 公分（圖二，6）。現藏固原博物館。

5. 磨棒

標本 17，1984 年西吉縣玉橋鄉蘇家村出土，同出有紅陶罐等，圓棒狀，一端磨平齊，一端斷殘，應屬一實用器。通體磨光，呈淺綠色中泛白。殘長 9.5、直徑 6 公分（圖二，7）。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6. 研磨器

標本 18，1987 年西吉縣大坪鄉左家窪村出土，同出有石磨等。上端呈方形，下端為圓球狀，中部有一圓坑，原似單面穿孔，未能穿透便放棄，上大下漸小。通體磨光，似漢白玉質地，長 8.5、上寬 1.8、球徑 5.5、孔徑 1.5、深 1.1 公分（圖二，8）。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7. 玉紡輪

標本 19，1988 年西吉縣平峰鄉葛岔村東出土。圓餅狀，中有一穿孔，雙面對穿，孔壁呈斜形，有旋轉痕，一面孔側有打擊小坑。邊緣經過打磨稍薄一些。白色玉質，直徑 8、厚 0.8、孔徑 1.5 公分（圖二，9）。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標本 20，1960 年固原縣蒿店鄉徵集。圓餅狀，中有一穿孔，雙面對穿，孔壁平直，上無旋痕。邊緣切割圓齊，通體呈深墨綠色，光潔度較高。直徑 5.8、厚 0.8、孔徑 公分（圖二，10），現藏固原博物館。

(三) 玉禮器

玉質禮器按一般分法可包括玉環、璧、聯璧、琮、圭等種類。玉環與玉璧之間原本無明確的界限，中間圓孔大的曰環，小孔稱璧。

1. 玉環、璧

標本 21，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一併徵集玉璧共有 9 件璧芯 2 件。圓環狀，磨製，一面平整光滑。單面直鑽，好孔壁呈斜形，璧有旋紋。平整一面有鋸割痕，另外一面在邊緣部留下一臺面，臺面在鋸茬折斷後經過磨平。通體呈綠色邊緣沁白，直徑 6.8、好徑 2.4、厚 0.5 公分（圖三，1）。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22，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形，表面磨光，器表不甚平整，中厚邊薄。單面鑽孔，好孔壁呈斜面，孔壁有鑽旋紋。邊緣不圓，明顯可看出鋸割後打磨痕跡。通體呈淡綠色，中有褐色斑紋。直徑 8.9、3、0.7 公分（圖三，2）。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23，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形，表面磨光。單面鑽孔，好孔呈斜面，璧有旋紋，用力一面好孔稍直。壁面有鋸割痕，一面平直，一面稍弧。邊緣基本規整，一邊徑雙面斜切打磨。通體呈黃綠色，邊沁白，中有褐色紋理，直徑 9.1、好徑 2.9、下 2.3 厚、0.62 公分（圖三，3）。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24，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環狀，圓周不甚規則，四面切割，一側較傾斜薄向另一側。單面穿孔，好壁呈斜面，上有旋紋。通體呈沁白色，直徑 9.5、好徑 3.7、厚 1.1—0.2 公分（圖三，4）。現寧夏博物館。

標本 25，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狀，磨製，表面平整光滑。好孔邊緣有一缺口，此係硬物撞擊時留下的崩口，另外部分也有三處小的缺口，但似經過打磨，可能係製作前所為。通體黃綠色，有一些褐角紋理。直徑 11，好徑 5.8、厚 0.55 公分（圖三，5）。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26，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形。表面磨光，一面有相向割鋸折斷時所留下的臺面，臺面錯位，沒有經過打磨，上留下簡單刮削的崩口，另一面斷茬

則經過打磨。好孔為單面直鑽，孔壁呈斜面，上有鑽研時留下的旋紋。邊緣亦不規整，亦有一些崩茬，三處缺口。通體呈菜綠色，上褐色斑塊。直徑 12.1、好徑 3.4、厚 1.2 公分（圖三，6）。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27，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形，表面磨光。單面直鑽，好壁孔呈斜面，上有旋紋。表面有相向割鋸時鋸痕，鋸痕經過打磨，形成中間厚，兩側薄。邊緣亦經兩面切割打磨。通體沁白，上有褐色紋理。直徑 12.4、好徑 4、最厚 1.4、薄 0.3 公分（圖三，7）。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28，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形，表面磨光，薄厚大致均勻。一面有相向割鋸折斷時留下的臺面，臺面高低錯位，沒有經過打磨，留有簡單刮削的崩茬。另一面的鋸痕則經過仔細打磨，與器表平齊。單面直鑽，好孔呈斜面，壁面鑽研時的旋紋清晰。邊緣有小崩口。通體青綠，邊緣沁白，直徑 13.5、好徑 4.3、厚 1 公分（圖三，8）。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29，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形，兩面均有相向鋸割時斷茬，一面斷茬經簡單刮削，另一面斷茬亦經斜面切割，然後仔細打磨。單面直鑽，好孔經呈斜面，壁面鑽痕清晰。邊緣部兩面均有斜切割面，切面亦經打磨。通體呈青綠色，邊緣沁白，直徑 14.5、好徑 4.1、厚 1.5 公分（圖三，9）。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30，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環形，壁面一面厚一面稍薄，薄面有相向鋸割時折斷所留下的臺面，臺面錯位，亦沒有經過打磨，只留下簡單刮削的崩口。好孔亦為單面直鑽，孔壁呈斜面，上有鑽研時留下的旋紋。邊緣亦不甚規整，留下一周斜面。通體呈綠色，有褐色斑塊，周邊泛白。直徑 14.4、好徑 4.1、厚 1.2 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31，1970 年代海原縣徵集。圓環形，表面磨光，器表平直，亦為一面光滑，另一面則有白色水垢跡。好孔邊緣在成器後經過打磨，孔壁平直，單面鑽孔後，邊緣亦打磨修整。通體呈菜綠色。直徑 16.2、好徑 7、厚 0.65 公分（圖三，10）。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32，1960 年海原縣徵集。扁環形，表面磨光，光潔成廣高。器表一面有相向割鋸折斷的臺面。好孔為單面直鑽，孔壁呈一個斜面，斜面上有鑽研時留下的旋紋。緣的兩側均有切割痕跡，可能是就原有玉料形狀加工的璧。通體呈黃色，黃中泛白（圖三，11）。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33，1984 年隆德縣沙塘鄉徵集。圓環形，呈餅狀，中間厚周邊較薄，雙面穿孔，孔壁中凸，邊緣不甚規整，緣部經過打磨，緣部有兩處缺口。通體呈米黃色，直徑 17.2、好徑 3.8、邊緣厚 0.8、好厚 1 公分（圖三，12）。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 34，1986 年隆德縣沙塘鄉徵集。圓環形，表面磨光製作規整。單面穿孔，

好壁呈斜面，壁面亦經過打磨，周緣亦經磨光。通體呈豆綠色，直徑 15.2、好徑 5.1、厚 0.7 公分（圖三，13）。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 35，1984 年海原縣海城鎮山門村出土，同出有玉琮、紅色夾砂陶罐等。圓環形，壁面薄厚大體一致。一面側有相向割鋸時結合部的拼茬，但拼茬經過仔細打磨較為光滑，細分辨則可看出向邊緣一側有傾斜面，另一側接近邊緣部，留有一長三角狀的斜槽略凹，是切割時較深，雖經打磨但未能磨平；另外一面在近好處有一明顯的相向鋸割時留下的斷茬，茬面橫貫壁徑，稍呈弧形，另一則 10 公分長的切割痕，割痕有二刀，略彎。好孔為單面直鑽，孔壁呈斜面，有 2 毫米之差。邊緣基本規則，經多次切磨，有二處碰損的缺口。通體呈褐色，壁面光潔，中有一些黃色斑點。直徑 25.5、好徑上 6、下 5.8、好厚 1.1、邊厚 1.2 公分（圖三，14）。現藏海原縣文物管理所。

標本 36，1986 年隆德縣沙塘鄉和平村出土，同出有玉琮等。圓環形，出土時已破碎多塊，後經拼合，仍有二小塊缺口。壁面基本平整，兩面均有近 10 公分左右的相向切割鋸痕，鋸痕經打磨，基本與壁面平齊，但仍可看出是弧形。好單面鑽孔，孔壁呈小大下小傾斜狀。周邊不甚規則，一些邊緣隨材切割，經過打磨，除缺口外，緣另有二處碰茬。通體大部分沁白，如石一樣，祇是在邊緣部位露一些青玉色。最大直徑 36、好徑、厚公分，形體甚大（圖三，15）。現藏隆德縣文物管理所。

2. 玉餅芯

標本 37、38，二件形制完全相同，均 1962 年固原縣張易鄉徵集。圓形，邊緣有一切割斜面，薄厚大體均等，通體為青色中泛黃，有白斑。應為玉環、壁中切割下的孔芯。A、直徑 4.9、厚 0.5 公分；B、直徑 5.8、厚 0.6 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圖四，1、2）。

3. 三聯璧

標本 39，70 年代徵集。聯成圓環狀，由三塊聯結而成，每個皆作扇面形，每塊均占三分之一，通體磨光，製作精美。內外邊緣切割整齊劃一，兩端穿孔，其中一塊兩端各一穿孔，另二塊一端一穿，另一端為兩個穿孔，穿孔為單面直鑽，孔壁面呈斜形，孔呈錐形。三塊當可聯繫。直徑 17.1、內寬 5.5、好徑 7、厚 0.6 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圖四，3）。

4. 四聯璧

標本 40，1986 年隆德縣沙塘鄉沙塘村徵集。四塊玉基本聯成環形，每塊大小不一。A，大片半圓形，緣部稍殘，一邊有兩孔，一邊為一孔，孔為單面直鑽，徑 22、內寬 8、厚 0.7 公分；B 呈三分之一，緣部一平齊，一側斜切，一側單面直鑽，

另一側有三孔，有一孔為鑽研時破裂後放棄，改鑽一孔，孔為雙面鑽。長 17.9、緣厚 0.4 公分；C，四分之一璧，一面兩側各有一完整穿孔，一孔為單面直鑽，打穿邊側後放棄，緣部一邊打磨，長 12.4 公分；D，約有十分之一璧，邊有四個穿孔，均為單面直鑽，一面有相向鋸割折斷臺面，寬 5 公分。四塊玉具中呈墨綠色，邊緣部分沁白色，色澤相近，應由同一塊玉料上切割製成。聯成整器直徑 24、好徑 8.3 公分（圖四，4）。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5. 玉聯片

標本 41，1986 年隆德縣沙塘鄉採集。單片呈不規則長方形狀，兩面均經打磨。邊緣薄厚不均，最長的一面明顯於裡邊緣。一面為一塊切割中有斜面裂縫，另一面則為兩次切割，相向切割有一明顯斷茬，一面切割有一立茬，另一切割痕為一斜面。從一面的斷茬上可看出，切割時還使用錘擊，四角分別鑽有四孔，兩孔垂直，兩孔傾斜，隨器而置，單面直鑽孔呈錐形，大小不一，孔徑分別為 0.8～1 公分。通體中為墨綠色，周邊緣沁白。長 25.1、寬 17.5、厚 2.1 米。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²⁴（圖四，5）。

6. 玉琮

標本 42，70 年代海原縣徵集。方柱體，射圈圓整，射與方柱角相接處呈弧形。方柱面基本呈正方形，柱體高較面短，琮孔雙面對鑽，中間稍窄，有鑽研痕跡。通體呈黃色，黃中泛綠。器高 5.2、寬 5.5、射高 0.7～1，孔徑 4.5 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圖五，1）。

標本 43，1960 年固原縣中河鄉徵集。方柱形，短射四角稍加打磨形成短射，射孔雙面對穿，壁面打磨光光滑。柱體四面切割平直，通體光潔，呈豆綠色。高 5.3、寬 7.5、射高 0.3、徑 5.3 公分（圖五，2）。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 44，1973 年代固原縣張易張毛窪北山梁出土。方柱體，四周稍弧，短射，射面不平整，有切割痕跡，射圈與柱體角呈弧形。琮孔為上下對鑽穿，下孔較長，呈喇叭形，上孔有鑽研旋紋，上部形成一臺面，最窄處孔徑僅為 1.5 公分。覆視四面寬度基本一致。通體呈黃色，黃中稍泛青色。器高 5、射高 0.8～1、孔徑 3 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圖五，3）。

標本 45，1979 年 9 月固原縣張易鄉毛窪北山梁出土。長方柱體，短射，其就是四角稍加弧切形在射圈，射底與方柱角呈弧形。琮孔為上下對穿，錯位後形成一個臺面。柱體四面寬度稍有不齊，邊緣多有崩損。通體呈白色，玉質較差，一半為

²⁴ 馬建軍，〈形制獨特的四孔玉器〉，《中國文物報》，1998 年 10 月 25 日，4 版。該文中稱此為四孔玉器，後經楊美莉研究確定其用途為圓圈之一部分（參見氏〈齊家文化的玉圓圈〉，《故宮文物月刊》第 18 卷第 3 期（2000），頁 1-9；另見楊美莉〈齊家文化玉器的性質與特色〉。

玉，一半為石，表面亦不光滑。器高 5.1、射高 0.4～0.6、孔徑 2.8 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圖五，4）。

標本 46，1973 年 9 月固原縣張易鄉毛窪北山梁出土。方形柱體，四邊寬窄稍有不同。短射，亦不圓，表面傾斜，四角稍加切割，呈弧角。琮孔上下對穿，錯位，孔壁留有鑽研時旋紋。通體磨光，呈白色，身有崩坑，器高 7.6、射高 1～1.5、孔徑 3.7 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圖五，5）。

標本 47，1960 年代海原縣徵集。方柱形，表面磨光，加工甚為精細，十分規整。射管為圓形，雙面穿孔，孔壁經過仔細打磨，平直光滑，沒有旋鑽痕跡。柱身方正，先由柱身向下切割，然後再由外向裡，形成方形射角。通體青色。中泛黃，通高 12、射高 1.5、柱射寬 6.8 公分（圖五，6）。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 48，1986 年，隆德縣沙塘鄉出土。方柱體，高射管，射管呈圓形，雙面穿孔，管為雙面鑽穿，孔壁面豎打磨，磨痕呈豎條狀，中部稍凸。方柱先為左右切割，然後由柱身角向下切割，形成方形射擊角。射擊管、柱均有切痕。通體青綠中沁白，通高 19.5、射高 3、徑 8、柱身寬 8.1 公分（圖五，7）。現藏固原博物館。

標本 49，1984 年海原縣海城鎮山門村出土，同出有玉璧、硃砂紅陶罐等。方柱體，通體傾斜。方柱向下切割，然後由外向裡切割，形成射管，八角均切痕明顯，射管面稍斜，口有二處缺口。射管為雙面對穿，壁面經過仔細磨光。柱體四面切割平齊，磨製光潔。通體呈墨綠色，中有一些白斑。高 12、射高 1.5、徑 9.4、柱寬 9.1～9.4 公分不等（圖五，8）。現藏海原縣文物管理所。

標本 50，1983 年西吉縣白崖鄉南灣村徵集。方形柱體，上小下大短射，射圈與柱體左右研磨成弧形角，四邊並不完全相等。琮孔上下對穿，穿孔結合處錯位，但經過打磨。器身一面陰刻一鳳鳥形象，鳥頭側向左邊，身呈正側面，吻部尖凸，呈錐狀。冠頂有二羽豎起，圓目，長頸，雙翼微張展，自然下垂，身繫一串三角狀飾物，腹部外露，長腿，有趾。陰線刻似採用某種鋒利的金屬工具，原鳳鳥為一體，但鳥頭部刻線較深，據觀察應為後期加工重刻，根據陰刻鳳鳥與琮體的磨損情況判斷，線刻與琮體同時的可能性很大，後來的擁有者加刻鳥頭，但亦表明後者熟悉這種刻玉工藝，大約相去不遠。通體磨光，呈棕黃色。器高 11.7、柱寬 6.8 公分。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圖五，9）。

7. 琮芯²⁵

標本 51，1986 年彭陽縣古城鄉徵集。上下有面，呈圓形，通體不規則，稍彎，上下小，中間大，原為廢棄的琮芯，連接處長一個臺面，器兩端均可見清晰旋轉痕跡。青綠色玉，器高 10、上徑 4、下徑 2.8、中徑 5.5 公分。現藏隆德縣文物管理所

²⁵ 參見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頁 7 及圖二：10。

(圖六，1)。

8. 玉圭

標本52，1984年，固原縣河川鄉上臺村出土。通體呈圭形，通體磨光。身雙面均凹，側端凸起，頂端平直，稍有損痕，側亦平直，右側邊緣有淺刨疤痕，端孔為雙面對穿，一面深，一面淺，亦為兩面在中間小，上窄下略寬，直刃稍寬於身，刃部鋒利，保存尚好。通體呈墨玉色，刃部半透明，十分華麗。長30、身寬3.5、刃寬4.4、孔徑0.8公分。現藏固原縣文物管理所(圖六，2)。

標本53，1999年西吉縣興隆鎮徵集。通體磨光呈長條形。頂端平直，一角有損，有兩面三刀圓形穿孔，上孔較大，孔徑為1.5公分，下孔較小，孔徑為1.1公分。身上小下漸寬，平直雙面刃，刃側端略有內收，刃面略有崩茬。通體呈黃褐色，有深線色紋理，可能屬於大理石之類。長29、寬7、厚1.2、刃寬6.5公分(圖六，3)。現藏寧夏博物館。

(四) 裝飾品

1. 玉柄器

標本54，長條狀，長方形柄首，握部稍弧，身部長方條形，十分平直，尖部似有損。通體磨光，十分光滑，白色脂玉。通長16.2、寬1.9、厚0.7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

標本55，長條狀，長方形首，端有一圓孔，孔為單面直鑽，呈錐形。柄身分界明顯，身條形平直，厚度約是寬度的二分之一。通體光滑，黃色。通長10.8、寬1.5、厚0.8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

2. 玉筒

標本56，直筒狀，上有20道弦紋，凸起的弦紋有損，弦紋分布均稱。中孔上大下小，但壁面經過仔細打磨。通體黃色，上有褐色斑點，有一條裂縫貫下。器高7.8、直徑6.4、孔徑4.9公分。現藏寧夏博物館(圖六，4)。

三、年代的簡單比定

一般考古學意義上的器物年代判斷，首先所依據複雜的地層關係，以及地層中所包涵文化面貌，在繁雜的文化層考古學者往往選擇大量存在的器物種類，作為確定相對年代分期根據。在早期遺存中，尤其是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人們所選擇的當然首先是質地脆弱的陶器。而玉器作為堅固耐用質地，決定了它變化速度慢，對年代變化並不敏感，研究者也已經關注到了玉器這類特性²⁶。玉器的變化所賴依存在的標準，我們只能在大量的陶器中尋找。令人遺憾的寧夏區並無此類遺址發掘，即

有可供判斷的標準陶器與玉器共生。我們這次普遍調查也許為今後發現此類遺址提供一些資訊，成為以後工作的基礎。

雖然有這樣困難的前題，但並不等於說我們在這些玉器時代確定上毫無作為。以上這些玉器從總體上來說基本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西北地區新石器晚期文化主要是馬家窯、半山類型²⁷、齊家文化²⁸。關於這兩種文化的大體譜系，基本上已經確立，已有確切疊壓的情況來判定其相對年代，馬家窯類型早於半山，半山類型又早於馬廠，這與C14的年代測定大體相同²⁹。齊家文化來源看法尚未統一，一種意見由甘肅馬家窯馬廠沿襲³⁰，另一種看法則稱其另有源頭，固原地區所謂的齊家文化墓葬，雖然與秦魏家、大何村等典型齊家遺存有共同之處，但區別卻很明顯³¹。典型的齊家文化器物卻不是從馬家窯中演變而來的³²。寧夏這類遺存或者屬於齊家文化的一支地方類型³³。寧夏遺存或相當於所謂的常山下層³⁴。隆德頁河子第二期相對年代約相當於秦魏家和皇娘娘臺遺址的年代³⁵，經高精度樹輪校正的C14年代為BP4070 ± 90。菜園遺址從陶器來看，一部分器物與常山下層有密切關聯。另一部分彩陶卻有著與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類型相類似的風格，而類似風格的器物卻並不見於常山下層。其時間上晚於馬家窯類型，卻早於齊家文化。³⁶因此，以齊家文化分區發展不平衡而言，菜園遺址可能是陝(西)、甘(肅)、寧(夏)交界地區文化的主要源頭。

菜園遺址中所出現的玉質工具，屬於零星發現，其中與石器並無太大的區別，功能或許一樣，屬玉器的實用階段。玉製石斧、鏃或相當於這一時期，因為與同期石質工具功能一致。頁河子二期與師趙村七期年代相當，後者遺存中發現相當數量

26 參見閻亞林《甘青寧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頁11。

27 所謂的馬家窯文化據說實際上仰韶文化晚期的一支地方類型，其中包括馬家窯、半山，馬廠類型(參見張學政、張朋川、郭德勇，〈談馬家窯、半山、馬廠類型的分期和相互關係〉，中國考古學會編輯《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50-71。)

28 關於齊家文化分期問題請參閱張忠培，〈齊家文化的研究〉，《考古學報》1987年1、2期，收入氏著《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市：文物出版社，1980)，頁50-71。

29 參見楊伯達〈齊家玉文化初探—記鑒定全國一級文物所見甘肅古玉〉頁63。

30 參見端居，〈齊家文化是馬家窯文化的繼續和發展〉，《考古》，1976年第6期，頁352-355；胡謙盈，〈試論齊家文化的不同類型及其源流〉，《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頁37-83，該文將柳灣稱為齊家文化「乙型」。

31 參見梁星彭，〈齊家文化起源探討〉，《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頁32-40。

32 同上，頁39。

33 陳昱、洪方，〈隴東鎮原常山下層遺存淺析〉，《考古》1982年第4期，頁392-397。

34 同注30胡謙盈文。

3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75年2期，頁57—95；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第四次發掘〉，《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頁421-447。

36 許成、李進增：〈菜園遺址的多維剖析〉，《寧夏社會科學》，1998年6期，頁78-88。

的玉璜、環、璧、琮等，其中三璜可聯為完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個二次墓葬中有璧、琮的完整組合。三聯或四聯璧也應與其同屬一期。大體上來說寧夏發現處於新石器晚期的這些玉器，時代上與齊家文化關係比較密切，但是否就等於齊家文化的東西，實際上就涉及到齊家文化的概念是有限外延，還是無條件拓展問題。菜園、頁河子遺址的發掘者有意無意不將其歸入所謂齊家文化的範疇，依我的理解或許不在說明時代的差異，而在於區分實際文化中內涵，但這些內涵有時則並非本質的差別，這也許是倡導者所始料不及的。

菜園遺址中 F13 窯洞建築規模宏大，被認為是一個許多人可以集體活動場所。（圖七、1）。窯洞周圍壁上有一些錐形孔洞，孔洞有插松枝跡象（圖七、2），在高出地面 5-130 釐米壁上共有 50 多處，其中有 26 處密集分佈在西壁上，這種洞孔構成了最原始的照明設備，年代經 C¹⁴ 測定距今 4100-4500 年³⁷。在窯洞的居住面上發現璜形漆器、鹿角柄、石器、陶器等多件。其中所謂璜形漆器最為引人注目，形狀似璜（圖七、3）木胎已朽，朱紅色漆皮尚存，素面，沒有穿孔，兩外角距離 65，兩內角相距 35、寬 16、外側厚 1.7 釐米。位於室內最顯要的位置，用途特殊。另有一件似經常使用的鹿角器，還有一件刃部無使用痕跡，表面用黑色黏合劑作彩料繪成樹狀圖案的骨匕（圖七、4）。種種跡象表明這個窯洞具有特殊用途，「漆璜」、鹿角柄器、彩繪骨匕可能是舉行宗教儀式時巫師所用的「巫具」，F13 窯洞被推測為可以容納許多人進行集體活動的原始宗教建築物³⁸。大型漆璜的出現耐人尋味，僅就形制而言，這件漆璜仿製玉器的成份很大，菜園先民們在玉石器不足或規模不如需要的大時，便採用其他物質製造替代品，木質品通過髹漆仍可達到某種祭祀或巫術時的特殊效果。顏色的選擇是髹漆工藝本身決定的結果，還有某種特殊意義使用朱紅色，或許是值得研究的。

四、器物種類特徵

寧夏地區的玉器在大的分類方面似乎不外生產工具，禮器和裝飾品三類。其中生產工具中當包括武器，在生產工具中實用器的特徵比較明顯。經過對一些斧、鏃的刃面窺察，似並沒有石器的磨損程度高，當然這與二者的硬度差異有關聯，玉、石即使同出，也不能確認為同時製造。除去這些因素外，可以推測先民們在對待玉斧、鏃與普通石器時尚有差異，至少是使用頻率小，或許所謂「崇玉」雛形由此而始。玉質生產工具在其中所佔據的數量比較，分布範圍較廣，與石器的關係最為密

37 陳斌：〈燈具的鼻祖—四千年前窯洞的壁燈〉，《文物天地》，1989 年 2 期，頁 20-21。

38 李文傑：〈寧夏菜園窯洞式建築遺蹟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 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頁 307-327。

切。

按照一般說法，玉琮、玉璧等屬於禮器之類。人們多傾向於玉琮，由圓向方發展。寧夏博物館藏弦紋玉筥值得注意，其上的弦紋整齊劃一，間隔距離相等，凸凹紋的深淺適度，是治玉技術成熟以後的產品。玉琮由低向高轉化，也是人們另一個看法，寧夏發現的較矮方形琮，穿孔技術則十分成熟，孔壁無凸起。柱形琮有的僅將方柱四角進行簡單割削，形成弧角短射。體形較大的琮將射角與柱體間切割呈直角。形體大小不一，是時間上的差異，或是其他因素構成，有待於以後材料的積累。玉璧的形制簡單，通體扁平，薄厚不一，直徑較小者，壁面光滑，經仔細打磨、拋光。較大者則在平面切割是往往留有一個相對鋸割斷茬，斷茬有的經過簡單刨刮，有的則經過打磨。

據說因為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們相信天圓地方，「因而製作圓璧與方琮禮拜天神與地祇」³⁹。其意在於溝通天地。鬼神天地崇拜是史前先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祭祀活動構成先民最初的禮制世界，並得到了廣泛的延緩，成為後來國家最重要的活動。禮制的設定可以規範人際關係，建立分配物力、人力資源的制度，史家深信禮制確立是構成國家的重要標誌之一⁴⁰。當然先民的信仰系統遠我們現在所了解的要複雜的多，玉琮、玉璧用於祭祀天地的實例，以目前的考古發現尚難指證。西北地區新石器晚期玉器中璧多琮少的現象已引起學者的關注⁴¹，不過是否可獲得一個重璧輕琮，這樣一個帶有普遍意義上的結論，恐為時尚早。繫玉聯璧的現象，或是西北新石器晚期玉祭的重要環節，有的學者將其與石圈崇拜聯繫起來⁴²。牛河梁的紅山文化石圍圈⁴³與大河村齊家文化的石圍圈⁴⁴，二者都具有宗教遺跡性質，研究者已從不同角度給予關注⁴⁵。大河村有五處石圍圈，旁邊有卜骨或羊、牛骨，

39 參見鄧淑蘋，《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概論》頁 163。

40 參見杜正勝，〈中國國家的起源及早期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 本（1987），後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市：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1992）頁 157-222。

41 參見葉茂林〈齊家文化的玉石器〉頁 258。

42 楊美莉，〈齊家文化的玉石圈〉，《故宮文物月刊》，18 卷第 3 期（2000），頁 1-9；楊美莉〈齊家文化玉器的性質與特色〉；楊美莉，〈紀元前三千年紀末黃河黃河流域的玉器〉，《璧光盈袖——居易書屋珍藏玉器》（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頁 11-17。

43 據原報稱其為祭壇式建築或積石塚（參見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塚發掘簡報〉，《文物》，1986 年第 8 期，頁 1-17；郭大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象徵——牛河梁紅山文化壇廟塚〉，載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16-24。

4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考古隊，〈甘肅永靖大河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4 年第 2 期，頁 29-61。

45 郭大順，〈遼西古文化新認識〉，《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203-215。

其中卜骨也存在於皇娘娘臺、秦魏家、橋村⁴⁶及頁河子等遺址中，新石器晚期的諸多遺址中都有卜骨發現，亦表明在該時期卜術存在的普遍性，石圍圈用來界定某種思想的觀點應該從信。四塊、五塊、六塊聯玉構成的圍圈，從形式上來看理解為同一思想的延續似無大錯，問題的焦點在於二者是時間上的差異，還是地域的不同。紅山文化中即存在石圍圈，或表明地域的不同不是主要的，紅山文化玉器發達，而石圍圈並沒有向玉圍圈的方向發展。臨汾下靳陶寺文化也發現所謂的玉圍圈則並不在齊家文化範圍之內⁴⁷，亦不能保證齊家文化玉圍圈的獨有性。石圍圈與玉圍圈時間上的差異，目前尚處於推測階段，各博物館中玉圍圈的收藏豐富了我們對其存在形制的認識，真正對於證實兩者之間直接關聯的推進，則有賴於今後的科學發掘⁴⁸。另外師趙村多玉聯璧與玉璧大約時代共生的事實亦不容忽視。穿孔的意義，是為了實際聯繫諸片玉，還是象徵性的扣合值得思考。總之，多聯玉可視為西北地區新石器晚期，某一特定區域有明顯特徵的器形之一。

五、西吉玉琮上的鳳鳥圖像

1985年西吉縣白崖鄉南灣村農民發現一件玉琮，關於與玉琮相關的一般情況，在李懷仁即將發表的文章中多有交待⁴⁹。關於這件玉琮上的鳳鳥圖案不外以下幾種看法：1、後刻；2、與器物同時鐫刻；3、與器物同時鐫刻但後期經過加刻。

46 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甘肅靈臺橋村齊家文化遺址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3期，頁22-24。

47 楊美莉將山西臨汾下靳遺址中出土的六塊聯璧歸結為有齊家文化風格（參見注34頁7-8），陶寺遺址與夏文化關係（參見高煒、高天林、張岱海，〈關於陶寺墓地的幾個問題〉，《考古》1983年第6期，頁531-536；張長壽，〈陶寺遺址的發現和夏文化的探索〉，文物出版社編輯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110-173、與龍山時代的關係（參見張岱海，〈陶寺文化與龍山時代〉，《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245-251。）另與齊家文化的關係（參見王克林，〈試論齊家文化與晉南龍山文化的關係—兼論先周文化的淵源〉，《史前研究》、1983年2期，頁70-80），尚多有討論，實際上陶寺文化在與齊家文化的聯繫中或與其玉、璧形態較為疏遠，僅為琮的表面切痕較相似而已（參見1閻亞林文頁21）。

48 葉茂林最近對這種提法提出質疑，（參見葉氏，〈齊家文化玉器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考古系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創建四十周年暨馮漢驥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市：巴蜀書社，2001年），頁190-194），問題的焦點仍然在於，楊美莉所謂的三個類型玉圍圈究竟在形態上相去甚遠，還是差別並不是很大。隆德沙塘發現的這枚四孔玉片，有一斜面，斜面當是有意切割的結果，並配有兩孔，說明繼續綴合的可能性是有的。臺北故宮藏六片大小相差無幾，邊緣有雙孔的玉器，經綴圍大體亦可成圈，由此可見沙塘玉片有可能屬於此類，類似推測，不無道理。隆德沙塘發現另一組聯玉，經綴合大體成璧形，臺北故宮亦有類似的藏品，楊氏所謂故宮藏第二、第三兩類實際上同屬一類，外圓不甚規則，內徑似較陶寺類型的玉圍圈較小。僅就形態而言，內徑大小或許是兩地聯玉主要特徵之一。聯玉問題僅從形態上考慮，顯然是不夠的，但從其數量分布範圍而言使我們不能輕斷其與其他文化的關聯，尤其在涉及其源淵關係時。

49 參見李懷仁，《新石器鳳凰玉琮》（待刊稿）。

該琮發現以後，筆者有多次觀察原器的機會，甚至有相當的時間該器寄存在筆者原服務單位，使我們得以隨時目驗。其基本印象是，琮為黃色中泛白，表面有侵蝕，其中有鳳鳥圖一面侵蝕程度，與其餘三面相當。鳳鳥圖肩部、腹部、左翼上有一些蝕過小坑，這些小坑打破了原來線刻（圖八，1），尤以腹部為甚。這樣即可排除後期刻劃的可能性。另外從其磨損程度看，原刻線條在上腹部基本已分辨不清，可知琮中部屬經常性磨損部位，可能與入土前經常性的執拿有關聯，有人稱此琮為鳳圖後刻的看法應予否定⁵⁰。再看其頭部，鳳鳥的頭部刻畫痕跡明顯較重，較重的部位有冠頂吻部、眼及頭頸分隔處。頭部應是在原紋飾磨損之後加刻，加刻線條較原線條為粗（圖八，2），刀痕澀滯，失去原線條流暢的風韻，線條較粗是多次補刀所致，後補者對原刻是否忠實也有問題，在頸右側輪廓應以外側為重線，內為輕線條，補刀者則以內線為重，補線似為原輪廓。琮上鳳鳥圖案約與原器同時，只是頭部經過補刻，即使補刻也應在入土之前，因此，這件玉琮上的鳳鳥圖案即便不與琮屬同時期製造，那也是在埋藏前的刻劃，只是總體造型顯得非常成熟，刀法流暢令人生疑，但事情總有例外。

琮，在上古祭祀活動中頒演重要角色，張光直曾言：「專以形狀上看，我們都可以說琮是天地貫通的象徵，也便是貫通天地的一項手段或法器」⁵¹，鳥紋形象在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中就已經出現⁵²。鳳鳥崇拜遂成為原始文化一個重要的問題。鳳鳥的具體形象，古人也有描述，記載紛紜，相互抵牾之處甚多，這裡僅揀其記述形象者加以討論。《爾雅·釋鳥》云：「鷩鳳，其雌鳳」。郭璞注：「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龜尾，五彩色，高六尺許」⁵³。《韓詩外傳》卷8云：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如何？」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晴雨。（略）」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衣於宮，鳳乃蔽日而至⁵⁴。

50 楊伯達稱「鳳紋玉琮是一件孤品，其琮形式與甘肅齊家文化玉琮相似，唯其陰刻鳳紋確為罕見」。「筆者未見到，不能判明陰刻鳳紋是原刻還是後刻。」（參見楊氏注5頁17）閻亞林稱：「寧夏西吉縣白崖鄉採集的一件有陰線刻劃鳳紋飾的玉琮是「熟坑」，經過仔細觀察和鑒定，紋飾是後刻劃上的」（參見閻亞林《甘肅地區史前玉器初步研究—以齊家文化為中心》1頁14注釋1），但並沒有寫明仔細觀察的經過和鑒定依據。

51 張光直，〈談「琮」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意義〉，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252-260。

52 參見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原載《考古學報》，1965年1期，後收入氏著《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157-189。蘇氏將陝西華縣泉護村出土的鳥紋圖案分為五式。

53 郝懿行，《爾雅義疏·釋鳥》（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頁1226。

54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卷8（成都市：巴蜀書社，1996年）頁681-682。

《事類賦注》卷18亦引云：

雄曰鳳，雌曰凰。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又鳴曰舊昌，昏鳴曰周常，夜鳴曰保長。（略）鳳能究萬物，通天地，合五音，覽九州，觀八極⁵⁵。

天老對於鳳凰的描述在許多書中都有記載，記述雖然多有不一，但來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⁵⁶，傳說中的黃帝時期鳳凰的形象已經模糊，鳳凰與皇帝的聯繫通過這些記載被確定。在南方發現的河姆渡、良渚文化中有不少鳥的形象。以鳥為天地之間往來的媒介⁵⁷。殷墟卜辭中有：

於帝史鳳，二犬。

依郭沫若的說法：「此言『於帝史鳳』者，蓋視鳳為天帝之使，而祀以二犬」⁵⁸，認為在殷周青銅器上饗饗的兩側所配鳳凰是傳達帝的命令的使者。鳳是帝使這一說法得到了斯維至、⁵⁹林已奈夫等人的進一步闡述，鳳凰在世是嘉獎王德，預告世間的平安，後世「雖然中心物件已經從帝轉移到了鳳凰身上，但鳳凰所有的自殷代到西周前期那種作為帝的意傳達者的性質幾乎是以完整的形態被繼承了下來」⁶⁰。鳳凰在上古時，人們大約以可飛行的鳥羽類為主來構想其形，其中加雜魚蛇、龜類的局部成分⁶¹，被賦予這樣複雜成份的鳳凰，其目的是為能迅速溝通上天與人間，琮上刻有鳳鳥鳳形其目的再明確不過。劉向雲：「夫惟鳳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優」⁶²。

55 吳淑，《事類賦》卷18「鳳」條注，頁5，3，四庫全書本。

56 《太平御覽》卷915引《帝王世紀》云：「黃帝服齊於中宮，坐於玄扈洛上，仍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4055頁。）

57 參見張光直〈談「琮」及其在中古史上的意義〉258頁。

58 郭沫若：《卜辭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二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頁337-378。

59 斯維至，〈殷代鳳之神話〉，原刊《中國文化研究彙刊》1948年第8卷，後收入斯著〈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論稿〉（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15-33。斯氏指出：殷代以鳳為風神，故鳳、風實一字。鳳鳥帝使，或言帝史、或言帝鳳即帝史鳳之省稱，均在甲骨卜辭中可找到例證，並於《詩經》《楚辭》等文獻有徵。

60 林已奈夫，〈所謂饗饗紋表現的是什麼——根據同時代資料之論證〉，載通口隆康主編，《日本考古學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蔡鳳書中譯本（東京：東方書店，1990）頁135-202。

61 許慎，《說文解字》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後，蛇頭麤尾，鶴頸鴛思，龍文虎背，燕鵠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故鳳象形，鳳飛群鳥從經萬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79）頁79。

62 向宗魯，《說苑校證·辯物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455-456。劉向所云大體與上引《韓詩外傳》同，此段《外傳》有脫文。

是萬物之神靈，其實當始於史前人類巫術。以目前發現而言，西吉玉綜鳳凰鳥圖案或許能傳達史前社會的人類精神世界。

六、玉器的製造工藝

玉器的製造工藝，由於在考古發掘中沒有發掘到治玉工場，所以關於其製造工藝的確定基本上停留在實物觀察階段。完整上好的玉製品諸多的加工痕跡在成品時被去掉，一些人也樂於採用一些半成品，做為觀察對象⁶³。寧夏地區新石器晚期一些玉器，在製作工藝上以稍粗糙一些，這也給我們研究其加工工藝帶來了一些便利條件。

寧夏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晚期的玉器，大部分在表面都有留有明顯的切痕，切割時的平整程度與玉璧直徑大小有關聯，直徑較小的璧一般只有一面有切痕，另一面則平整；稍大的璧則兩面都有切茬。這種片切技術往往顯得不大成熟，以固原張易鄉一組玉璧為例，這類特徵較為明顯。每次切割事先都有規劃，其理想厚度約為1公分左右，但切割過程中並未按事先預設好的計劃進行，不是愈進愈厚，便是愈切愈薄（圖八，3）。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便從另一面再進行切割，兩面鋸割茬基本上沒有重合的可能，只能在相當處折斷，從而形成不在同一平面的斷茬。兩面的斷茬，都經過修整，不過原則似乎不一樣，平整一面的斷茬經過仔細打磨，茬面較高的地方亦經過斜面切割（圖八，4），另一面斷茬則用簡單刮削（圖八，5）玉璧邊緣部分如原材碰撞缺損，則經斜切打磨，似以光潔為目的，關注厚薄均次之。如此說來，當時治玉人的本意不是採用雙面對切的技術，而是在不能很完成原計劃時的一種補救措施，單面片切是當時人們治玉的主要技術。璧面鋸割痕大多平直，個別也有弧形痕跡，表明人們似乎使用的是一種片鋸。也有一塊璧側面呈弧形，側面呈弧形或許說明是使用軟性工具，因為只有軟性鋸才會形成這種結果。在鋸方法上，這樣薄厚差異較大的玉璧，推測是因上而下，前後方向運動才可形成，如果鋸割時採用的是水平左右方向鋸割，則不會形成那樣大的薄厚差別。這九件玉璧從材質上看基本都出自同一塊玉材（圖八，6）只不過有的出自中心，有的則是玉皮，其中有三塊紋理紋理基本相連（圖八，7）。鑽孔是採用單面直鑽，好璧呈斜形，用力的一側壁面平直，旋紋清晰（圖八，8），大孔往往在鋸痕明顯的一面，小孔則在平滑的光面，或許可推知當時人們所使用璧，只使用平光小孔的一面，另有鋸痕的一面則顯得無關緊要。

63 參見吳棠海，《認識古玉——古代玉器製作與形制》（臺北：中華民國自然文化學會，1994）。

玉琮的製造，先將玉材切割成方柱體，固原張易三件玉琮，琮體及射管及射面均不平整，製作粗糙。方柱的八角被切下，形成射管，甚為簡單，切割的方法，並非直切，而是在側面用研磨的方法將射管與柱體之間磨成弧形角，角上有左右研磨時留下的旋痕（圖八，9）。隆德沙塘玉琮，則射管較高，由上向下切割，柱角由外向裡切割，在射管底部留下明顯的刀痕（圖八，10）。寧夏博物館收藏的海原玉琮，則表面加工精細，一些鋸痕經過仔細打磨。射管均為兩面對穿，孔壁旋轉鋸痕十分清晰，有的旋痕約有0.1公分寬，是使用很粗的解玉砂。上下孔徑為上大下漸小，先從一端鑽下，過半後再從另一端下鑽，至結合部時然後由裡向外敲擊，形成斷茬截面（圖八，11），從斷面上看雖上天下下，但仍有筒鑽的痕跡。這樣上大下小的結果，可做如下解釋即管徑的大小與琮射最小的徑相等，射管上大的情形主要是鑽孔時用力磨損形成大孔。類似的推測亦可解釋隆德收藏的一件琮芯，中心當是射徑最小直徑，雙面對鑽後，從一面打擊，形成一個較大茬面。按照一般的說法，玉器製造過程中管鑽法的流行，可以節省玉料。其實根據以上分析，管鑽法根本沒有節約材料的功能，而且鑽下的琮芯似無其他用途，但管鑽法無疑可以節約大量工時，節省治玉所用工時，大約是採用管鑽法的主要優點。

切割、鑽孔這些技術層面問題，或是具有某種地域特徵，也許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掌握一種較為先進的金屬切割技術。西北地區在新石器晚期，已經進入了一個銅石並用時代，齊家文化中的製銅業中青銅製器已占有相當大的比重⁶⁴。從而使金屬工具在治玉技術中的使用變成可能。

七、結 語

以上我們用了相當篇幅介紹和討論了寧夏地區新石器晚期的玉器，或許可使我們對其基本面貌有一個大致印象。作為西北地區新石器晚期玉器研究中的基本材料之一，這些材料也許值得注意，但我們也一再提及類似材料的局限性，現在對這些材料恐怕還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只是通過這些材料的整理，讓人們逐步在範圍上了解新石器晚期玉器分布的廣泛性。

1、寧夏地區玉器大體上與新石器晚期本地文化有密切關聯，寧夏南部馬家窯類

64 在西北地區的馬家窯類型中就已出現銅器，并有範鑄（參見北京鋼鐵學院冶金史組，〈中國早期銅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頁287-301）。雖然也有人懷疑這些標本的可靠性（參見安志敏，〈試論中國的早期銅器〉原載《考古》1993年12期，後收入氏著《東亞考古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中心，1998，頁146-153），從更大範圍內來看，仰韶文化晚期人們已經知道了煉銅（參見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頁36-44、齊家文化中存在數量較多的青銅器卻是不爭的事實（參見嚴文明上揭文頁38-41，安志敏上引書頁148及張忠培〈齊家文化的研究〉，頁142-144。

型是該類中一個地方特色相當濃厚的地方類型⁶⁵。以現有知識玉器的出現晚於這一年代。我們雖然推測絕大部分玉器約相當於齊家文化時期，但由於田野考古材料的不完整性，發掘所得到的只能是零星玉製工具。在整個所謂的“龍山時代”則是一個禮制形成時期⁶⁶，玉璧、琮是祭祀活動的主要物品，寧夏數量較多的發現表明與其他文化同處於大體相等的發展水平，是反映特定時代某些特殊關係的重要材料⁶⁷。

2、西吉玉琮上的鳳鳥圖案，是目前所見最符合文獻記載中鳳凰形象，鳳凰是東方人類崇拜形象，其向西北轉移，或有某種特別原因。

3、過去發現的西北地區新石器期的玉器，給人總體印象是素面無紋飾，製作不甚精良，西吉鳳鳥圖玉琮、海原青玉琮、玉璧卻是作工精良，切割打磨技術非常嫻熟，無疑採用了較為先進的金屬工具。這也與西北新石器晚期已經首先進入了一個銅石並用時代的事實相吻合。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西吉鳳鳥琮成熟的刻劃方法，就知其並非無源之本，從天而降，而是有著宏大的技術層面背景做為支撐。

總之，寧夏地區新石器晚期的玉器值得進一步關注，當然在缺乏田野發掘材料配合的情況下，過多的詮釋，其真實性反而令人生疑。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寧夏博物館、固原博物館、海原縣文物管理所、西吉縣文物管理所、固原縣文物管理所、隆德縣文物管理所等單位的大力協助，值此一併致謝。

65 〈寧夏海原曹窪遺址發掘簡報〉頁209。

66 高璋，〈龍山時代的禮制〉，《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235-244。

67 中國考古學中一個著名的現象就是重出現玉器，從南至北，由紅山到良渚，從東部大汶口文化至西北的齊家文化，都出現數量不等的玉器，有人甚至提出一個與石器、青銅、鐵器時代分庭抗禮的所謂175「玉器時代」（參見曲石，〈論中國的玉器時代〉，《中國的玉器時代》（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1-30）。事實上，不存偏激的學者一般都認為所謂的玉器時代談論從技術層面上或者在提示中國歷史發展的深層問題上，尚不足以構成對石器與銅器之間的物質形態涵蓋，所以玉器時代的提出，毋寧說對總結龍山時代這一特定時代的生產關係更有意義（參見陳星燦，〈青銅時代與玉器時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考古求真集—96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29-42）。



圖 1-1 玉斧 西吉沙溝鄉沙溝村徵集 現藏固原博物館



圖 1-2 玉斧 西吉縣興隆鎮羅莊村出土 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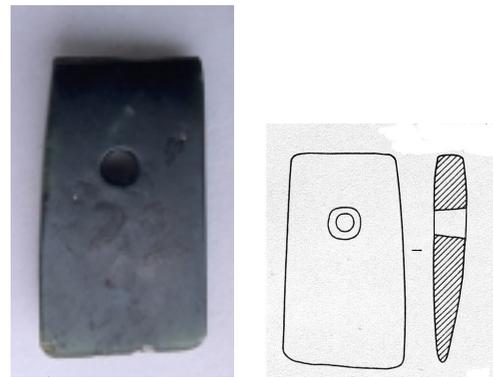


圖 1-3 玉斧 西吉縣白崖鄉斜路窪村徵集 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圖 1-4 玉斧 西吉縣白崖鄉半子溝徵集 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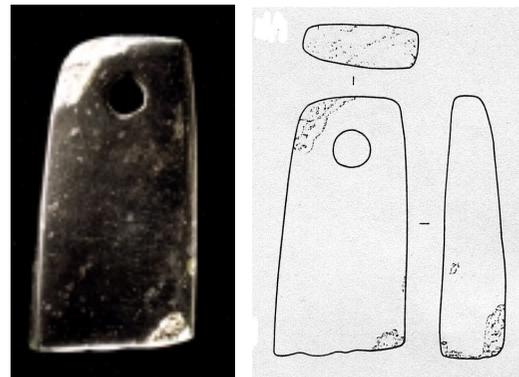


圖 1-5 玉斧 固原縣官廳鄉官廳村黑馬泉出土 現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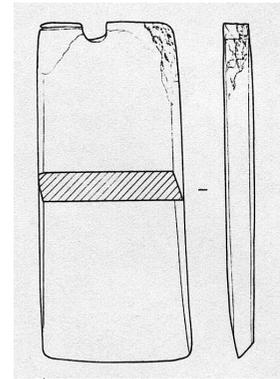


圖 1-6 玉斧 隆德縣徵集 現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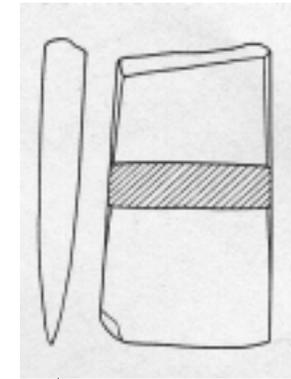


圖 1-7 玉斧 海原縣菜園瓦嘴 WM134:12 出土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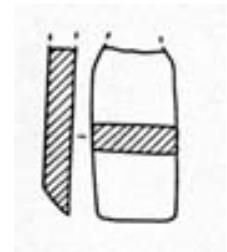


圖 1-8 玉斧 隆德縣河子遺址 T103:3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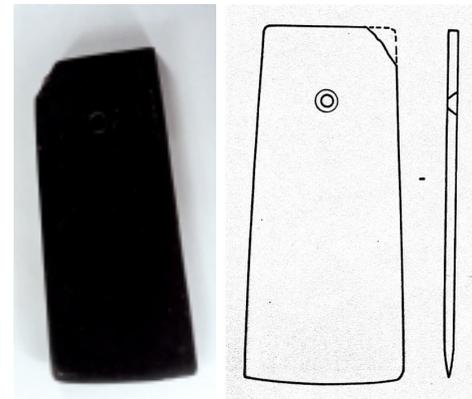


圖 2-1 玉鏹 西吉縣興隆鎮出土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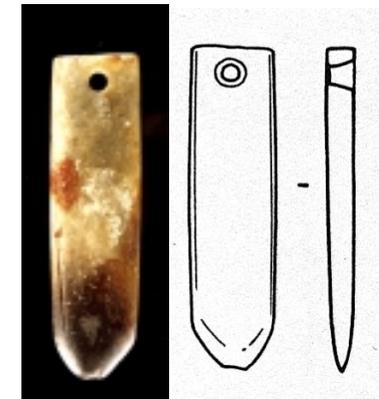


圖 2-2 玉鏹 固原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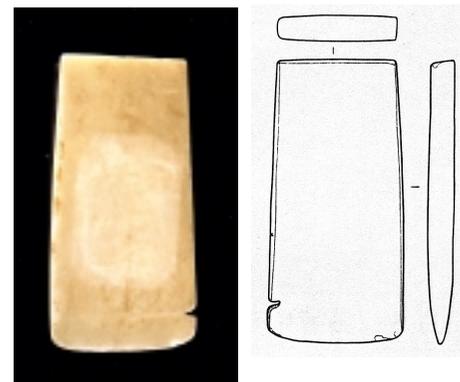


圖 2-3 玉鏹 固原縣河川鄉上臺村徵集 現藏固原縣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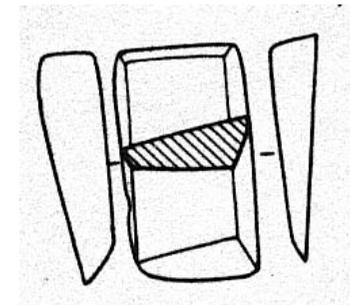


圖 2-4 玉鏹 海原縣菜園 WM34:05 出土 現藏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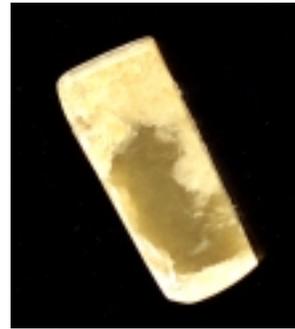


圖 2-5 玉鑿 隆德縣風嶺鄉上齊家村出土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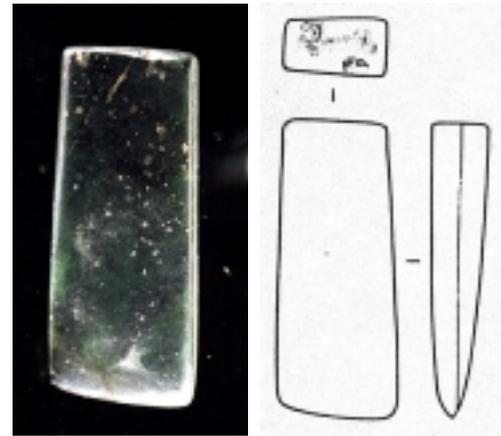


圖 2-6 玉鑿 固原縣官廳鄉官廳村黑馬泉出土 現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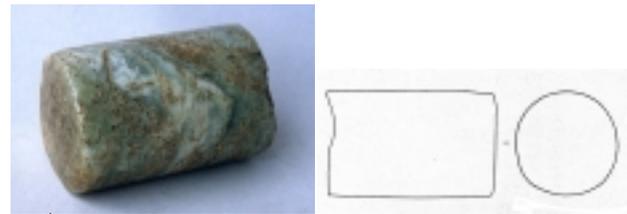


圖 2-7 磨棒 西吉縣玉橋鄉蘇家村出土 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圖 2-8 研磨器 西吉縣大坪鄉左家窪村出土 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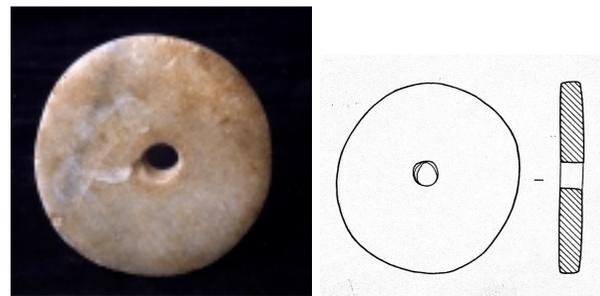


圖 2-9 玉紡綸 西吉縣平峰鄉葛岔村東出土 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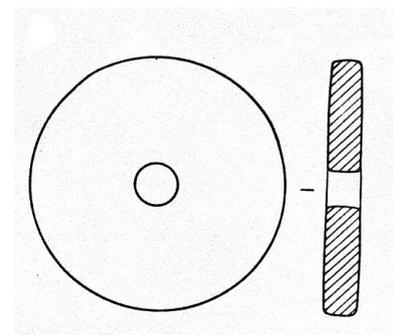


圖 2-10 玉紡綸 固原縣高店鄉徵集 現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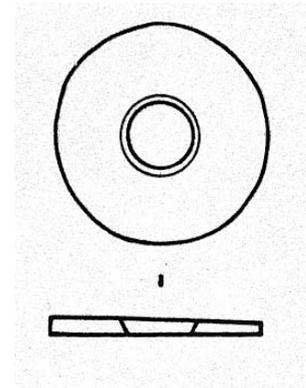


圖 3-1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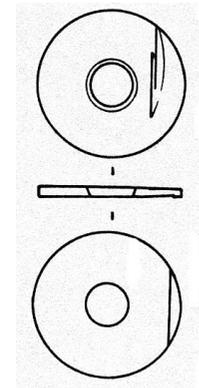


圖 3-2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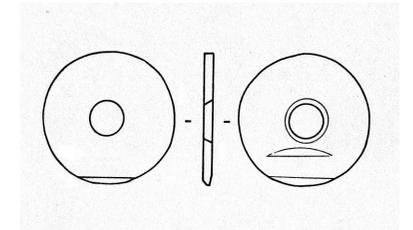


圖 3-3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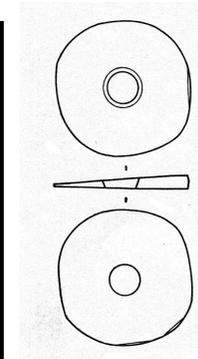


圖 3-4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圖 3-5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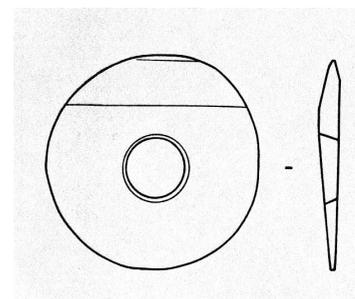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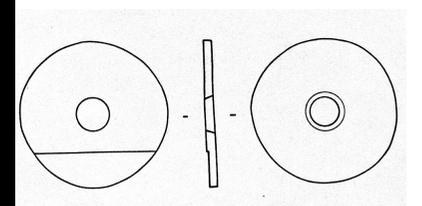


圖 3-6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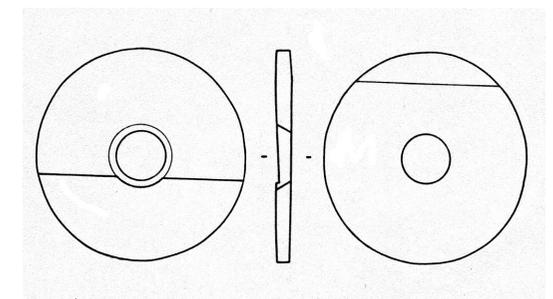


圖 3-7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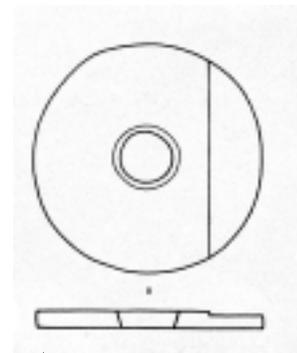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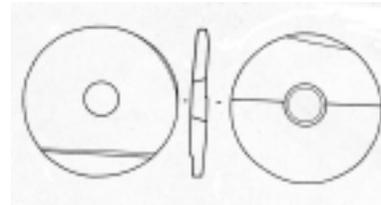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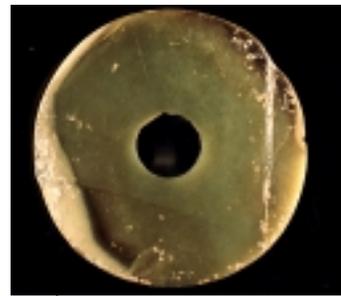


圖 3-8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圖 3-9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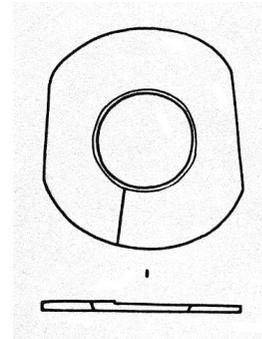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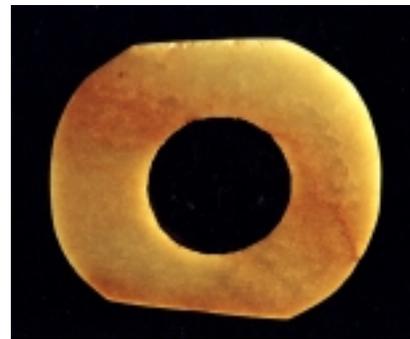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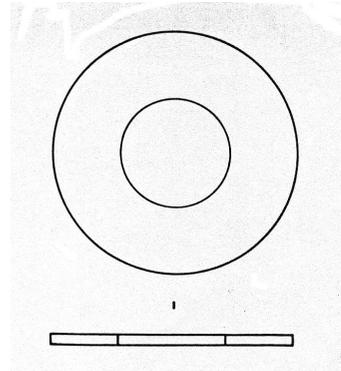


圖 3-10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圖 3-11 玉環、璧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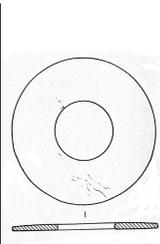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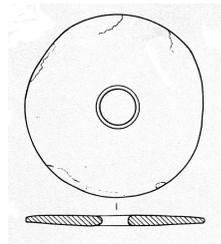


圖 3-12 玉環、璧 隆德縣沙塘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圖 3-13 玉環、璧 隆德縣沙塘鄉徵集現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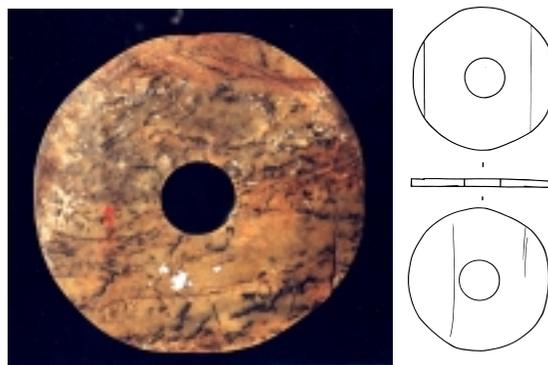


圖3-14 玉環、璧 海原縣海城鎮山門村出土 現藏海原縣文物管理所 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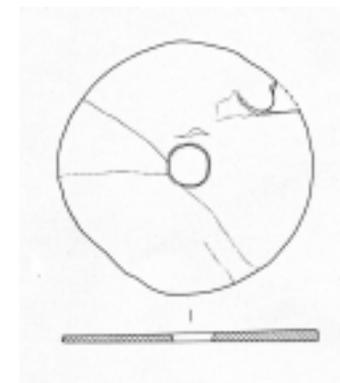


圖 3-15 玉環、璧 隆德縣沙塘鄉和平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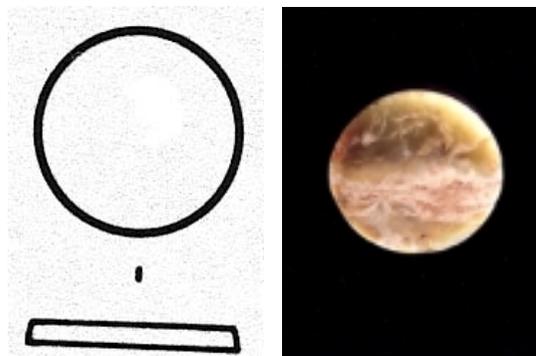


圖 4-1、4-2 玉餅芯 固原縣張易鄉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圖 4-3 三聯璧 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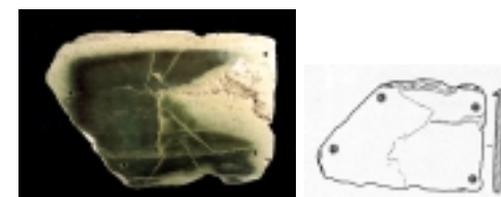


圖 4-5 玉聯片 隆德縣沙塘鄉採集 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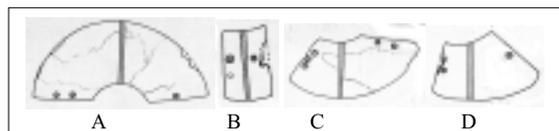


圖 4-4 (A,B,C,D)四聯璧 隆德縣沙塘鄉沙塘村徵集 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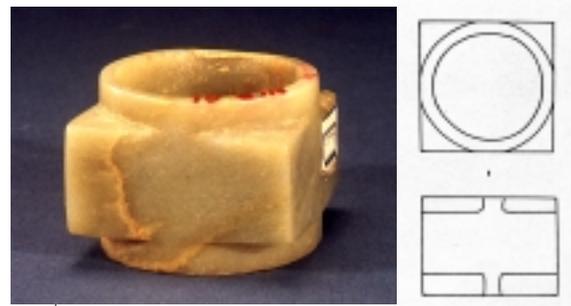


圖 5-1 玉琮 海原縣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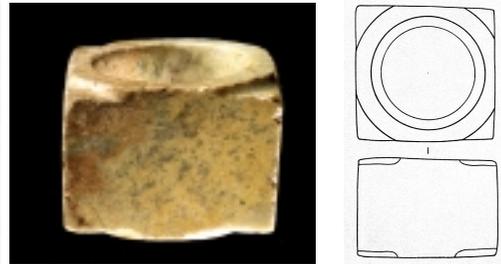


圖 5-2 玉琮 固原縣中河鄉徵集 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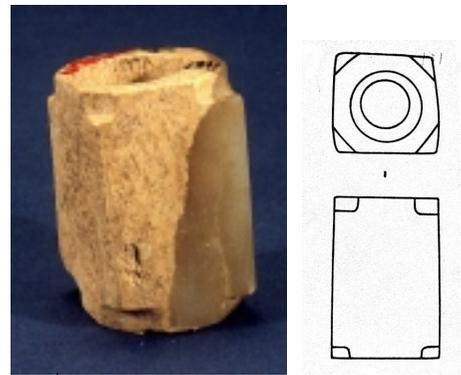


圖 5-3 玉琮 固原縣張易張毛窪 北山梁出土 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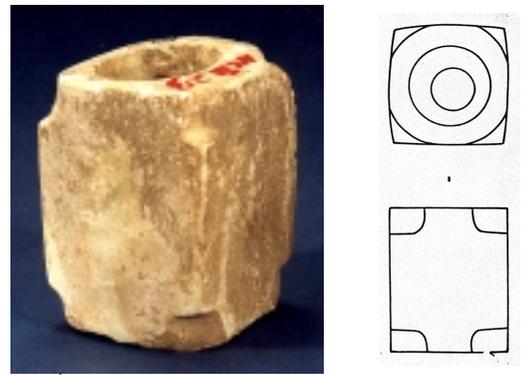


圖 5-4 玉琮 固原縣張易張毛窪 北山梁出土 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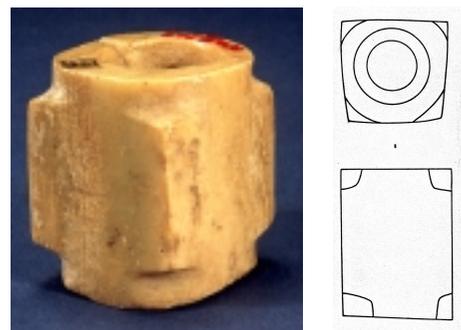


圖 5-5 玉琮 固原縣張易鄉毛窪北山梁出土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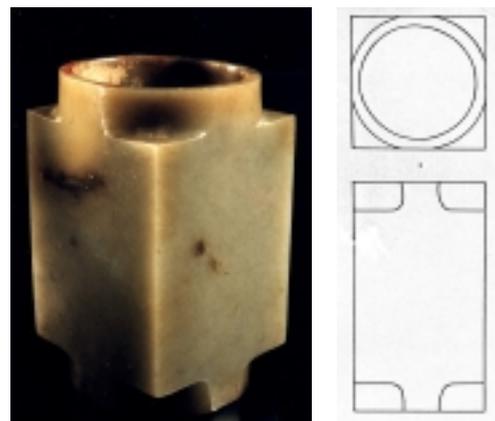


圖 5-6 玉琮 海原縣徵集 現藏寧夏博物館



圖 5-7 玉琮 固原縣河川鄉店河村出土 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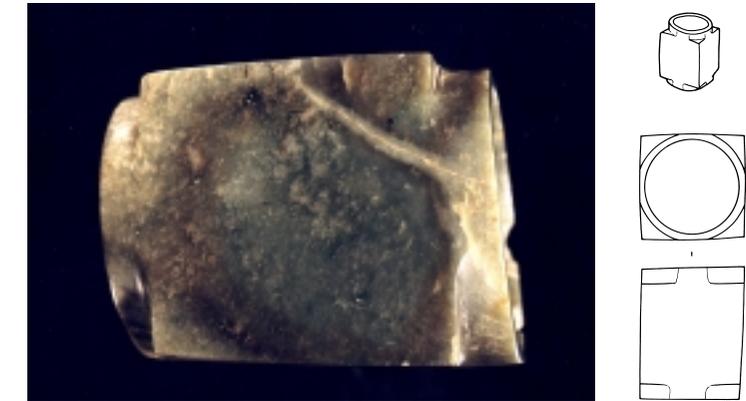


圖 5-8 玉琮 海原縣海城鎮 山門村出土 現藏海原縣文物管理所



圖 5-9 玉琮 西吉縣白崖鄉 南灣村 徵集 現藏西吉縣文物管理所



圖 6-1 琮芯 彭陽縣古城鄉徵集
現藏隆德縣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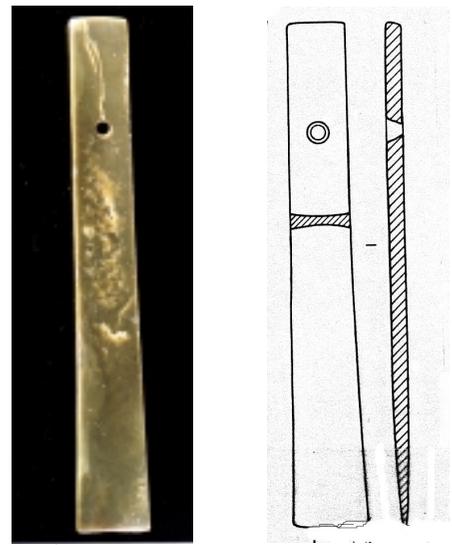


圖 6-2 玉圭 固原縣河川鄉上臺村出土
現藏固原縣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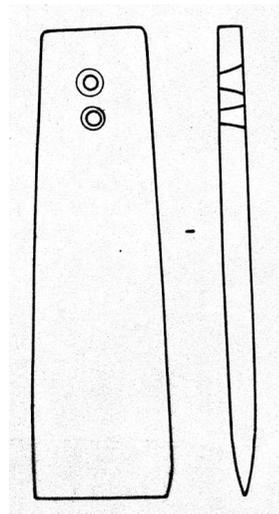


圖 6-3 玉圭 西吉縣興隆鎮徵集 現藏
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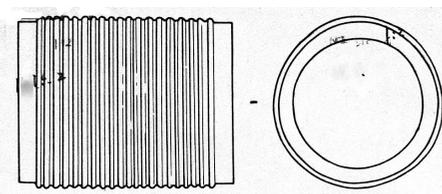


圖 6-4 玉筒 現藏寧夏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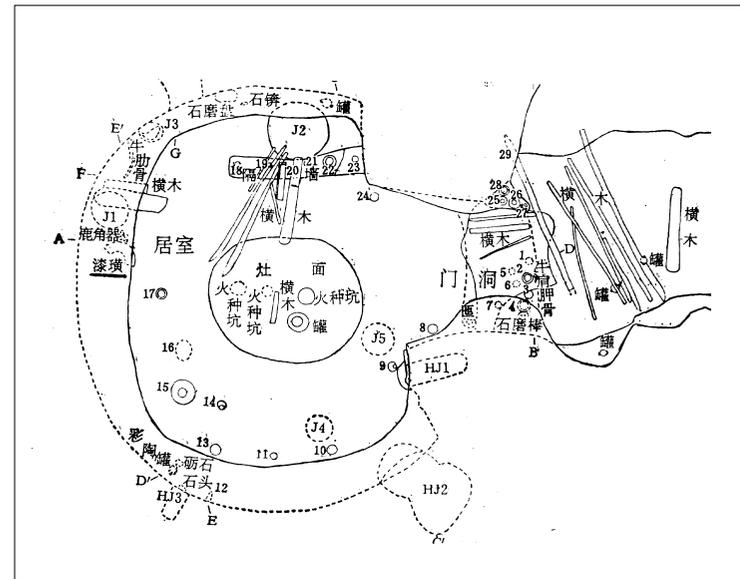


圖 7-1 窰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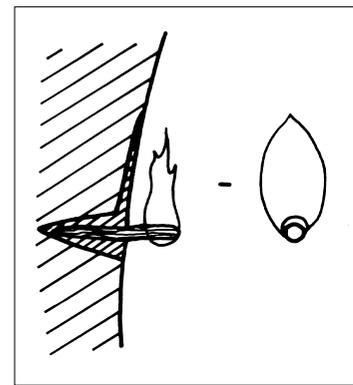


圖 7-2 第 10 號壁燈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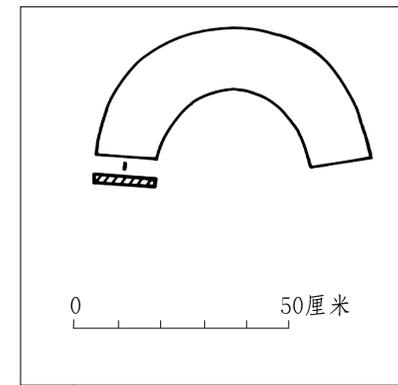


圖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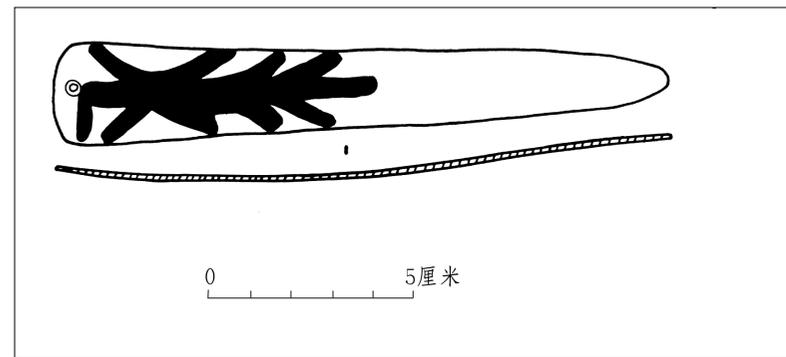


圖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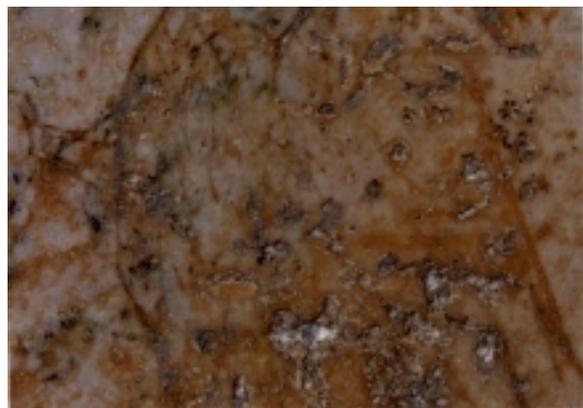


圖 8-1 玉琮上的鳳鳥圖案 西吉縣白崖鄉南灣村出土



圖 8-2 玉琮上的鳳鳥圖案 西吉縣白崖鄉南灣村出土



圖 8-3 玉製品的加工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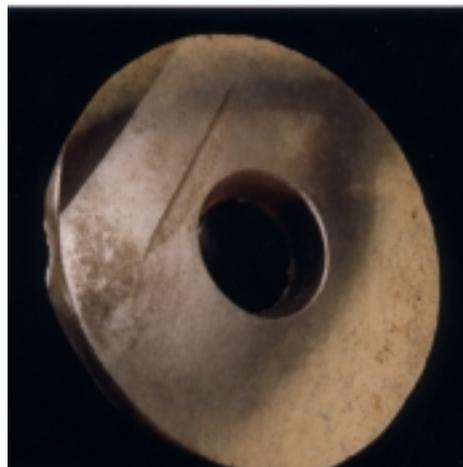


圖 8-4 玉璧茬面 較高處的斜面切割



圖 8-5 玉璧斷茬用簡刮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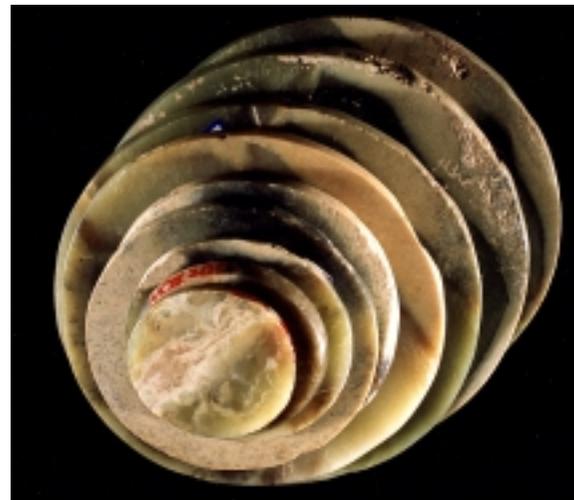


圖 8-6 玉材有的出自中心，有的則是玉皮



圖 8-7 三塊紋理紋理基本相連



圖 8-8 單面直鑽孔，好璧呈斜形，用力的一側壁面平直，旋紋清晰



圖 8-9 玉琮製造研磨時留下的旋痕



圖 8-10 玉琮製造射管底部留下的刀痕



圖 8-11 玉琮製造 斷茬截面